

马克思实践论“自然观”及其生态难题回应

牛庆燕

(南京林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 全球性的生态难题暴露了人类认识自然理念和观念的危机。马克思的“自然观”内蕴于人类的劳动实践之中,劳动的异化带来人的“类本质”的丧失、人性的“物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透过劳动实践的中介,能够推进人的“类”意识的觉醒与“异化”的扬弃,它突破了技术实践基础上的机械论自然观,超越了伦理实践基础上的道德自然观,实现了“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辩证契合。因此,准确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论“自然观”,为正确认识并积极化解生态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哲学的思考维度。

[关键词] 异化;劳动实践;自然观;生态难题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6-0079-06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危机,同时也是人类认识自然理念和观念的危机。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能够在科学理性的反思下,重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和伦理观。人类要从“自然观”的认知层面实现对生态困境的超越,就有必要重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实践论“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透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在系统总结历代哲学家自然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通过人类实践的中介,超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困境,实现了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契合共生,为当下人类积极应对生态难题提供了“自然观”的道德认知凭藉和道德哲学的思考维度,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人与自然的“异化”

“异化”一词源于拉丁文“alienation”,具有让渡、转让、疏远之意。黑格尔曾经在其主体的自我内部精神的矛盾运动中指明,“异化”实际上是主体内部精神的自我否定过程,是转化、派生出自我的对立面并压迫、制约自我与他物的过程。费尔巴哈借助“异化”批判宗教中的神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过

程。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社会批判理论揭示了人类面临的时代困境,“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但在同时,它却又在维持着苦役和行使着破坏。个体由此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他的时间、意识和欲望;而文明所付出代价则是,牺牲了它向人们许诺的自由、正义和平。”^[1]这便是由人的劳动异化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文明社会的异化。

基于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对人性做出了原初的“本真状态”的假设,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行,出现了人性的扭曲与异化,马克思由此进一步展开了社会批判理论:人的能动创造本性作用于自然,自然应当成为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质的外化;然而由于人的类的本真状态的丧失,出现了人的异化,自然的人化也就不是真正人的自然,人类与自然为敌必会带来自然与人类为敌,即自然以一种异化的姿态奴役、主宰、压迫人,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 19 世纪工业社会所造就的商品经济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然而,在发达资本主

[收稿日期] 2012-03-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X066);江苏省教育厅 2011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1SJB720006);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

[作者简介] 牛庆燕(1978-),女,山东泰安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道德哲学、生态伦理。

义工业国家中,物质财富增值的背后却是人的世界的贬值,当劳动成为异化于人的类本质而存在的机械活动时,人的生命活动便同人相异化,人类原本的类本质追求便成为人类个体谋求生存的手段,人类便失去了作为能动的自由主体的性质,成为劳动的异化存在。马克思批判指出,劳动的异化促动着人与自身“类本质”的异化,

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应当是推动人类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动并不断实现人的“类本质”的过程。人类作为生命主体和类存在,在意识与道德自我意识的激发下,应当能够不断反观和思考自身的生命活动和生存生活,从而不断趋向生命的自主与“自由”。马克思分析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实践活动却是以异化劳动的形态呈现的,异化劳动的进行成为人的“类本质”不断流失的过程。异化劳动下,人类的生活、生命与动物的谋生活动相同,人之为人的本质蜕化为谋求肉体生存的手段。然而,肉体生存一旦上升为人的生命的本质追求,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也就模糊了。

异化劳动伴随而来的是异化消费,物欲消费成为人类生命存在的终极目的,“物”的占有成为人类生命本真状态的表征。如此,物的世界反过来占有和支配着人的世界,人类在物欲的牵引下成为物性的人格化再现,人类的价值和尊严的衡量标准便成为对物质占有的多寡和等次高低,物质欲望的释放和满足,使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极度“物化”,人拜倒在“物”的脚下,成为物的奴隶。如此,人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和满足成为生命的终极目的,贪欲的释放和人性的堕落同时涌现,物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以及对自然的疯狂占有和征服必然成为自然世界的景象。

在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中,自然成为人类物欲占有和征服的对象,它不再是人的本真力量的表现和确证,而人类则在丧失了自身的类本质的基础之上成为臣服于物欲的工具。当人类欲望的释放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便成为人类的工具意义上的存在,人类被物欲工具化,自然被人类工具化。人类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存在价值,蜕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自然失去了作为系统生命的有机整体性,成为原子化的孤立、静止、僵死的质料存在。自然相对于人类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系统价值甚至内在价值。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而演变为纯粹的目的与手段、征服与占有的关系,原本应当具有的生命关爱和道德关怀被遮蔽,纯粹的物欲征服背后掩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进一步引发人

类活动对自然的过度干涉,以及自然对人类滥用的疯狂报复。

马克思曾经指出,当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就产生了。这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由人的异化所引发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异化,也是近现代以来生态困境的历史导因之一。

二、劳动实践与“异化”的扬弃

(一) 劳动实践——必要的中介

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从劳动实践的视角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明确指出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中介,劳动实践使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成为区别于动物的生命存在,成为具有自身本质力量的类存在。“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3]169}并且,“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3]157}即,人类作为“类”存在物,其超越于动物的本能式生存方式,是在一种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指导的生命活动中,依靠自身创造的文化和知识的力量不断地确证自身,追求生命的自由和自主的过程中实现的。自然作为客观存在的生命本体,其存在并不以人类的物质需要和意志愿望为转移;人类作为能动的意识主体,只有在利用工具并积极地改造自然的生命活动中,才能够在自然中获得物质资料、能量与信息,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个必要的中介转换,这就是人类的劳动实践。

劳动实践活动促进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并把统一的自然分化为“人化的自然”与“自在的自然”。如前所述,人类作用于自然的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消极本能式的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人类通过实践活动积极能动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也是自在的自然不断被“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成的过程。当然,通过实践活动的中介,人也不断被自然化和社会化,这就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以及“自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自然化”相统一的过程。

首先,“人化的自然”与“自在的自然”。“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

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3]126}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自在自然被打上人类的目的和意识的烙印,按照人的方式和人的需要规定物质的自在存在形态,从而转化为“为我之物”参与到自然规律支配的自在世界的运动过程之中,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3]131}“自在自然”相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言则是具有一种先在性和客观性,而实践活动相对于自在自然而言则具有历史局限性,它永远无法穷尽自然许多未知的奥秘,因此又需要不断的“人化”的力量予以不断地探索。

其次,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实践活动是人类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与联系的纽带。人类作为自然存在物,依靠劳动实践的力量从自然中获得提升,并且“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的介入使得人类从原始混沌状态中独立出来,超越于动物的本能生存而成为人之为人的存在,在人化的自然中不断地生产和创造属于自身的新的生存状况和规定性,因此,人类的活动既依托于自然并符合自然的运作规则,具有“自然性”,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塑造着个人与他人的价值互动关系,而“自然性”与“社会性”同样依靠劳动实践的中介获得统一。

因此,只有在社会的劳动实践中,自然才成为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离开了人类社会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无法理解,“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178}自然恰恰只有在依靠人类的理性和智慧而获得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后,自然的存在、本质与规律才在人类的理解下获得广泛而生动的发展,不断印证着自然存在的内涵与价值,“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3]157}“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122}即,人类的社会属性与在社会中进行的实践活动共同推进人与自然的统一,续写着作为自然史的人类历史。

因此,综上所述,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主体的

自然与客体的自然、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相统一的中介和纽带,劳动实践的发生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成为可能,并进一步推动着人类世界的历史演进。

(二)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已经从实践本体论的视角指明了人与自然界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的人们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就等于说自然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3]95}因此,人类应当把自然这种人的无机身体作为自我生命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弃绝统治自然的工具性和目的性思维,因为遵循自然规律实际上也是在尊重人的“类”的内在规定性。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相对于人类而言,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研究价值与审美价值,推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完满,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自己的无机身体、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自然由某种“价值之链”和“存在之流”联系起来,人在自然之中,自然在人之中,人类自身的命运与自然自身的命运、自然的未来与人类的未来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三)“类”意识的觉醒与“异化”的扬弃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视角出发,必然会使突破传统自然观的局限,把伦理关注的范围扩充到人与自然宇宙万物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扬弃人与自然、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离和对立,使自然在真正完整、稳定和美丽的意义上绽放自身的价值,使人类在“类”的生命完整性和丰富性的角度表现自身的意义,因此,人类在理性自觉地掌握现代高科技成就的基础上应当超越人与自然消极意义上的原始的共生和谐,而寻求人与自然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动态平衡,在尊重自然与人类生命存在的基础上建立良性互动和共存共荣的生态关联。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是一种扬弃人的自我异化、使人向合乎人性的“类”的方向复归、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过程,自然在不断的“人化”过程中也便成为真正的人本身。马克思在其社会批判理论中指出,在一种自发的形成的社会当中,只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还存在分裂,并且分工还不是出

于个体自觉自愿的活动,那么,人类的劳动就是异于人类生命活动的异化劳动。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人类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自然成为对象性的人本身。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¹²⁰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上扬弃了人的本质异化的社会条件,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并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解,“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4] 这是生态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路径,彰显着马克思实践论“自然观”的伦理意蕴。

三、实践论“自然观”及其生态难题回应

马克思的“自然观”强调人类生活实践是人与自然交流与互动的桥梁和纽带,实际上,人类生活实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式谋生的根本方式,是人类在满足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基础之上的主体能动体现,是人类超越了生物性的本能式生存之后,在伦理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所达成的生命意义追求。因此,“自然观”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内蕴于人类的生态实践之中的,这样的生态实践“自然观”突破了技术实践基础上的机械论自然观,超越了伦理实践基础上的道德自然观,在精神文化追求基础上实现了“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辩证契合。

(一) 技术实践与“机械论自然观”

求生存是人的生物本能,动物依一种生存的本能从外部自然中直接获得物质满足,而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重要之处恰恰在于获得物质资料的方式,在一种思维意识的作用下,人类能够借助于劳动工具的中介,通过劳动实践活动间接地从自然界获得物质满足。人类这种实践活动是借助于技术的手段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称为技术生活实践,

这是历史上自有人类的实践活动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出现的最基本的实践关系模式。

“文艺复兴以来日益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促进了机械技术的发展,并激发学者们借鉴机械技术的成功,用机械论的思想理解大自然的运行。”^[5] 人类以技术实践主体的身份把自身的需要和尺度赋予自然万物,作为衡量自然价值的标尺,因此,人类的技术实践活动成为直接的、有限性的目的活动,以无限性地满足自身物质需求为目的,并发展为向自然征服和掠夺的实践活动,自然成为单纯满足人类需要的有用物,在客观对象性的意义上被解析和探索,自然生命系统的丰富性和有机性被忽略甚至放逐,这就演化为“机械论自然观”。“主体是高级的,意味着能动、主动、积极,而自然界的事物,也就是客体,则是低级的,处于被动、受动、消极、受控等地位”。^[6] 传统“主客二分”的工具论思维模式割裂了自然的科学认知价值与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关系,并且,这种近代工业文明时期的二分式思维模式在张扬和增强了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也同时暴露了人类生命物种发展进程中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在物欲膨胀的精神背景下忽视了人与自然的一体相关性和自然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囿于人类狭隘的物种利己主义的单一性和片面性,从而忽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审美维度,实践和认识活动成为人与自然相关联的唯一纽带,从而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近代文明时期这种“主客二分”的工具式思维使得人与自然进一步分离和对立。“‘技术理性统治’是现代文明困境的技术根源,当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攫取自然资源的有效手段时,科技异化了。”^[7] 由此,自然界在人类初年作为大地之母的神圣性和至上性被彻底颠覆。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当自然界被机械僵化的观念所重构时,自然的世界便演化为死寂被动的物的世界,科技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类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野蛮史,因此,人类早期的技术实践内蕴着需要加以辩证否定的机械论自然观的设定。

(二) 伦理实践与“道德自然观”

人类在伦理生活实践基础上不断建构着属于自身的“道德自然观”。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担保,道德生活是人类生存基础之上的核心体现,当人类以人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生命时,既展现了自身的生命价值,同时也赋予人与自然之间直接的伦理关系,这是人与自然本质实现统一之后的内在规定,推动着人类在对技术实践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伦理实践的跨越式提升。作为“类”的人的

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是人类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生境、社会以及物种自然界的系统完整的道德关怀,更是人类对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道德意识的觉醒和自身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完善,在传统人际伦理的文化背景上开拓生态伦理的崭新视野,要求人类在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层重新检讨和审视自身。

“人类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我们向更好的未来进化。”^[8]人源于自然并与自然一体相依,人类既是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人类的生命存在与命运以及自然的生命机体的持久存续与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热爱自然、关爱生命不仅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在要求和终极使命,也成为人类趋善的行动诉求和实现生命崇高的道德承诺。居于自然与社会联结枢纽之上的人类应当进行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和意义思考,站在狭隘的人类中心立场难以真正对自然生态系统引发一种由内而外的热爱、尊重与敬畏情感,人类只有依靠生态道德意识的觉醒,动员情感的“道德冲动”力量,基于“类本质”的人性“普遍物”,用真心、伦理精神和道德思维去培养对自然的“爱”的情感,关爱自然万物,真诚关注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困境难题,进行道德哲学形上高度的价值了悟和统摄性的生态把握,为当前的一系列生态难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和探究。如此,不仅是关爱人类自身的情感影射,而且是应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生态难题的可能的有效之途。

这是人“类”的生态道义责任,也是应对生态困境的理论突破口。由于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在人类伦理实践观的作用下,伦理与道德的关注视野由传统的人与人拓展到人与自然,以伦理和道德的人性把握方式关爱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生命自然界,这就是生态伦理所极力倡导的伦理实践及其“道德自然观”。

(三)生态实践与“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辩证契合

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能够在生态实践的基础上建构属于自己的生态“自然观”,这是人类全面发展的表征和人类自然使命的觉悟和觉醒,它应当超越人类技术实践的有限目的性和伦理实践的价值抽象性,从“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辩证契合的高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对话、融合与交流的视野中建构辩证与开放的“自然观”体系。

“世界是一个自身有生命、渗透着神性、处于生长过程的有机体,世间万物都由其生长而来。”^[9]整

个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不仅是人类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与整个自然生命系统协同进化的历史。“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10],人类是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内部要素,人类作为自然之子,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人与自然二者具有内部同一性,人类依靠自身理性的力量可以能动地改变自然却不能脱离自然而孤立存在,因为“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某种目的性,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11]。所以,人能够超越自身却永远不能够超越自然本身,只有在有意识地维护自然的和谐与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够确保人类自身的永续与繁荣。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运行有利于维护地球生物圈的稳定、完整和美丽,这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运行本身的内在目的和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态伦理实践是人类在经过痛彻的自我反省之后的“自我发现”,是拯救生态危机并探求可持续发展的深切的人文忧患,是一种对客观自然规律科学认知基础之上产生的谦恭和敬畏的伦理心态,是“真”与“善”相伴而行的伦理使命和伦理责任。

从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到对“人定胜天”的执着,直到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确认,显现着人类道德不断进化的足迹,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的存在,同时也是社会的存在和精神价值意义的存在,人类能够通过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反观”将自然物作为审美对象,将自身的“自由”建立在对自然的爱抚和尊重之上,在遵循自然之“是”中不断超越,达到“应是”状态,在“精神自由”不断实现的过程中,达至“物我一体”的诗性境界。如果说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存在是为了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需要,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则是为了修护人与自然生命系统的整合与互动,这既是自然生态秩序平衡的维系与构建,更是人类长远的生存利益的需求。在此种“自然观”的关照下,人们以道德的情怀关爱自然,关注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人类的全面发展和最终解放与自由为旨趣,实现人类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并释放自然丰富全面的多维价值。生态实践论“自然观”站在“全球视野”的文化高度关注整体的生态难题,力图融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意志和道德行为,从而共同面对和处理人类世界的生态困境,寻求一种“诗意栖居”的绿色文明生活境界,它既是人类道德意识形

态的完善和进步,更是人类文明形态的进展和飞跃。

由此,人与自然之间应当包含一定的伦理关系,人类理应“有德性”地对待自然,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人类应当积极修复被损坏的环境,对自己的生存家园进行自觉的护理和照管,并努力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生态道德责任,这是人类对其“类本质”不断把握和占有的表现,是“类本质”力量不断彰显的生命过程,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然之途,是绿色文明时代“人与自然完成了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黄勇, 薛民,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9.

[2] 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7.

[3]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4] 马克思. 资本论[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926-927.

[5] 刘大椿. 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44.

[6] 肖显静. 后现代生态科技观[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87.

[7] 牛庆燕. 重建生态平衡: 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26 (2): 79.

[8] E·拉兹洛. 人类的内在限度[M]. 黄觉, 闵家胤,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5.

[9] 刘大椿. 自然辩证法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88.

[10]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09.

[11] E·拉兹洛. 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M]. 闵家胤,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88.

[责任编辑: 夏畅兰]

Marx's "Nature View" on Practice and Response to Ecological Dilemma

NIU Qingy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exposed humans' idea crisis of recognizing the nature. Marx's "nature view" grew up from humans' labor practice,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brings the loss of people's "species nature", the humanistic "materialization" and the "alien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labor practice, will awaken the people's "species consciousness", and discard "alienation",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mechanism nature view based on technology practice and transcends the moral nature view of ethics practice, having realized the dialectical fit of "practice-awareness-aesthetic" chain of "nature view". Therefore, accurate 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Marx's "nature view" on practice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actively resolve ecological challenges on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dimension.

Key words: alienation; labor practice; nature view; ecological dilemma